

我的歷程

(1908-1949)

伍修權



我的历程

伍修权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责任编辑：王 伟

封面设计：洪 炉

我的历程

伍修权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1/32·印张6²⁹/₃₂·字数120千字

1984年7月第一版 198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0

书号：10185·41定价：0.70元

三十年代在莫斯科中
山大学时的伍修权同志



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
的伍修权同志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时的伍修权同志



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军区干部会上讲话时的伍修权同志



一九四六年在军事调处执行部伍修权同志与叶剑英同志合影



一九四九年春伍修权同志在东北葫芦岛对国民党“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讲话



一九六一年伍修权同志在福建长汀留影

目 录

- 一 青少年时期(1908年—1922年)
- 二 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1925年)
 - 我的导师和革命引路人 (8)
 - 初期革命活动 (12)
 - 远离故乡, 赴苏学习 (18)
- 三 在苏联的五年半(1925年秋—1931年夏)
 - 漫长的旅程 (21)
 -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24)
 - 在莫斯科步兵学校 (33)
 - 在苏军远东司令部 (37)
- 四 回国前后(1931年夏)
- 五 在中央苏区(1931年—1933年)
 - 进入苏区 (48)
 - 首次参战 (50)
 - 到红军学校 (54)
 - 在模范团和红三师 (60)
 - 在汀连分区 (62)
- 六 难堪的任务——为李德作翻译

(1933年10月—1935年1月)

- 李德到苏区 (66)
- 李德是怎样“指挥”的 (70)
- 长征的准备 (75)
- 长征初期 (77)

七 历史转折性的遵义会议(1935年初)

- 会议的促成和召开 (81)
- 会议的结果 (86)
- 会议的后话 (88)

八 艰险曲折的长征路(1935年)

- 从遵义到会理 (92)
- 过雪山草地和粉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 (96)
- 胜利到达陕北 (100)

九 从东征到陕甘宁边区政府

(1936年2月—1938年2月)

十 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

(1938年2月—1941年5月)

- 兰州办事处的建立 (112)
- 宣传党的政策, 开展统战工作 (116)
- 活跃的抗日救亡运动 (123)
- 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 (129)
- 与苏联代表处的联络工作 (132)
- 指导和帮助地下党组织 (137)
- 险恶的环境, 紧张的工作 (141)

	兰州办事处的后期活动	(147)
十一	在延安军委总部(1941年5月—1945年9月)	
	热烈紧张的战斗生活	(152)
	外事活动和大生产运动	(159)
	难忘的整风运动	(162)
	党的“七大”和抗战胜利	(165)
十二	收复东北(1945年9月—1946年4月)	
	飞离延安	(167)
	与苏军的不愉快交往	(169)
	成立民主联军和撤出沈阳	(171)
	为了未来的人民空军	(174)
十三	在军调部执行小组(1946年4月—1946年底)	
	第二十七小组的建立	(176)
	在长春执行分部	(179)
	叶剑英同志到东北	(181)
	延安探亲与北平之行	(183)
十四	在东北军区(1947年初—1949年底)	
	一项新的战斗任务	(187)
	在辽沈战役中	(191)
	“捷报声中，将军忽殒”	(193)
	就任沈阳卫戍司令	(195)
	“重庆号”巡洋舰的起义	(197)
十五	开国和还乡	
	后记	(205)

一 青少年时期

(1908年—1922年)

长江中游的武汉市，是我的故乡。一九〇八年三月，也就是光绪末年的农历二月，我出生在武昌的一个小职员家庭里。当时，我的祖父伍伦奎和父亲伍理钊都在清朝湖广总督衙门的一下属机构里，充任文书一类的低级职员，在经济上算是一个小康之家。我的母亲朱三姑一共生育过十个孩子，其中一儿一女在幼年时便不幸夭亡了，我是活下来的八兄妹中的老四。听长辈说，我家原籍在湖北省大冶县，那里有我们这一姓的祠堂，过去每隔三年就要去续一次家谱，在这期间新出生的男丁都要去报名上谱。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我的出生地武昌成为首先起义成功的革命名城。对于这场革命，我只是后来从父母们口中听到，那年十月十日，武昌城里到处打枪，攻打总督衙门及其军队。由于清朝统治者主要是满族人，起义以后满族人纷纷出城外逃，把守城门的起义军哨兵为了区别出城者是本地人还是满族人，就让每个人念一遍“六百六十六”这几个数字，凡是没按湖北

方言将“六”念成“陆”的，就当作满族人抓起来，结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许多人。当时的男人都蓄着长长的辫子，起义以后就有一些自命为革命派的人物，满街拉人强迫剪辫子，很短时间就将每个男人拖着长辫子一扫而光了。不过这次革命胜利后，我的家庭生活却受到了直接的影响。由于清朝衙门的倒闭，我父亲和祖父同时失了业，全家只得靠先前的少量积蓄度日，当时我才四岁，还不懂得其中的困苦。一九一三年祖父去世，家庭生活从此江河日下，开始衰败下来，不久家境就沦为城市贫民了。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复辟称帝时，我父亲在他的旧交吴元泽（湖北襄阳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是吴德峰同志的叔父）家里当管文牒的“师爷”，得点生活费。后来，黎元洪当大总统时，吴元泽又带我父亲到了北京，找到在陆军部任职的李书城（他是我党“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建国后曾任我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农业部长），吴元泽想在自己找个职位的同时，也为我父亲谋个差使。经过他的活动，先给我父亲挂了个“候差”的空衔，领取数量很少的干薪，住在湖北会馆里。他在生活上节衣缩食，每一季节都积攒点钱寄回家。这样“候”了一个时期，谋事的希望终于完全落空了，只得丧气地返回武昌。我记得他当时从北京回来，只给家里带了几个“心里美”萝卜，还带回几样当时我们看来认为很贵重的药品：一种是北京同仁堂的眼药水；一种是“金老鼠屎”，其实只是一种金色的有老鼠屎大的治肠胃病

的普通药丸。他经过千里跋涉，多方奔走，只带回家这些“宝贵”礼物，可以想见那时他谋生度日的艰辛和家境的窘迫。

一九一八年，父亲回到家中，求职当然更加无望了。家里的东西变卖一空，依然无以为生。他就给学校里抄写讲义，誊写石印蜡纸，每写一页，可得几个铜板，就这样家里还是经常无米下锅，我自然也没有机会上学了。那时我已十岁，记得经常买红苕(红薯)糊口度日，在市内买还嫌贵，就由我同哥哥跑到十几里外的长江边上，直接找乘船运红苕来的农民买，这样可以多少便宜一点。尽管来去一趟要两三个小时，常常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但能买到稍微便宜的红苕，心里也是满高兴的。为了生计，家里又找了些零星杂活，象糊火柴盒子，就是全家人一齐出动，不分早晚拚命地干。当时还闹什么选举，有大量的选票要叠起来，这也是挣钱的一个门路。尽管我们不放过每一个机会，不辞辛劳地干，可是生活仍然难以维持，连房租都付不起，就搬到差点的房子里去。住了一阵，还是付不起房租，又搬到更差的房子里。结果，在不长的时间里，一连搬了四次家。从已经很坏的房子，搬到了条件更差的贫民区。刚到贫民区时，我们开始还有四间小屋，以后还是因为住不起，又划出了一间。全家十口人，住了三间小屋，薄瓦盖顶，冬寒夏热，下雨就漏，每天晚上都要临时搭铺，早晨掀起放在一边，不然后人就无法落脚，我那时就跟着奶

奶一起睡。我的母亲除了为全家人做饭、洗衣和缝补外，还自备了一把剃头刀，亲自为每个孩子剃头，好省一点理发费。全家人穿的布鞋，也都出自母亲手中，我从小就见她几乎每天不停息地糊布片、做鞋帮、纳鞋底和纳鞋。正是她老人家的血汗，才使我能活下来并长大了。我家的地址在后来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东边，现在那房子早已荡然无存了。那时我们有好几家邻居，一家是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一家是卖甘蔗、桔子的小贩，一家是挑剃头担子的理发师。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底层劳动人民。他们的孩子也就成了我的好伙伴，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不少事情，学到了不少东西。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波及到武汉时，也在武昌的大中学校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学生都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武昌的两条主要大街，一条是南北向的长街，一条是东西向的察院坡，到处都挤满了游行的队伍。那天我正好到蛇山去挖做炭巴的红土，在街上看到了那么多的学生，虽然那时我还不了解这一行动的政治意义，但是学生们的热情却引起了自己的无限羡慕。晚上，各校学生又举行了提灯游行，我又去看了热闹。这些活动对于武汉市民和我，都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在那以前，我没有上过学，只由我的叔父教过一点“四书”，但那时只知道背诵，并不懂得其中的意思，仅仅认识了一些字而已。一九二〇年，我家邻居的一个工人的儿子，

在武昌高等师范附属的“单级学校”读书。他问我想不想上学，说他们那个学校不要钱。我说当然想去。因为不要钱，家庭也就没有阻拦。就在那年春节后，跟邻居的孩子去那学校考试，因为我已经认得一些字，又会一点算术，就被收下了，并被插进二年级二期。那时我已十二岁，比正常的上学年龄晚了好多年，可是我仍然很高兴，眼前展现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所单级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在一间教室里同时教四个班，每班十多个学生。老师先教一个班，例如一、二年级的学生学算术，三年级的学生学语文，四年级的学生则在写作文，然后交换。这样，不同年级、不同课程交错进行，各班互相配合。老师确实很辛苦，象走马灯似的来回穿梭。但他教学得法，安排得井井有条。也许是环境所迫，他的“精讲多练”的方法倒使我们学得比较扎实，使人至今难以忘怀。我在这所单级学校学了一年半的时间。

一九二一年夏，省里因为教育经费不够，停办了这所单级学校。老师看我在这段时间内学习如饥似渴，一直很用功，成绩也很好，就推荐我免费进入高师附小的四年级，校方也同意了。因为家里困难，做不起校服，我就穿着老百姓孩子的旧布衫上学，不过我的功课好，待人也诚恳，老师和同学同我的关系也很好，避免了因为贫穷而容易受到的歧视和侮辱。在那里我又读了三年，直到毕业。

这所高师附小是一个很简单的学校。我在该校四年

级时，级任老师叫熊器叔，长沙人，是长沙第一师范毕业生。他思想进步，工作努力，教学有方，学生们都很喜爱他。他是全校文娱活动的主持人，每两周有一次学生联欢会，至少每月一次，那时叫做“余兴”，内容是讲演、扮双簧、演话剧等，讲稿和剧本都是他自己编写的。我是他写的演说稿的主要讲演者，也是他编写的剧本的主要演员。这些课余活动的锻炼，对我以后的工作和活动是颇有裨益的。

一九二二年，我在五年级时，来了一位新的级任老师，他就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同志。级任老师相当于现在的班主任，与学生的接触很多，关系很密切，对学生的思想影响也比较大。这样，陈潭秋同志就成了我革命思想的启蒙人，正是他在次年冬亲自介绍我参加了“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他的直接引导、帮助下，我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参加革命，符合“穷则思变”的道理。正因为家庭破落，在社会矛盾中处于下层阶级，贫困与苦闷迫使我要求改变现状，要寻求出路，除了投身革命行列外，别无它法。这是我走上革命道路起首要作用的第一个社会物质生活的因素。还有第二个精神意识的因素，就是有了陈潭秋等同志和几位进步老师的引导教育。他们的革命真理之火，落在我们这些要求变革的贫困青年的干柴堆里，必然会燃烧起来。第三个因素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给予自己的现

实教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悲惨现实，随时随地都在启发我们初步的革命思想。这也就是存在决定意识。正是这三个因素，促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